



# 中国“农业接班人危机”:分析框架、现实判断与破解之道

韩占兵

(1.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工商管理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3; 2. 黄淮学院 经济管理系, 河南 驻马店 463000)

**摘要:**“农业接班人危机”是中国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中必须面对的复杂问题,对粮食安全、农业可持续发展和新农村建设提出了严峻挑战。本文确立了“三维一体”的分析框架,即从历史进程、地域差异、体制与文化三个维度以新生代农民群体为切入点对中国“农业接班人危机”进行现实判断,进而提出在短期与长期两种视角下破解中国“农业接班人危机”问题的战略取向与政策选择:即短期鼓励农民兼业化,长期向职业化迈进,同时进行新生代农业接班人培育和农业生产经营体制机制创新。

**关键词:**农业接班人;农民兼业化;农民职业化

**中图分类号:**F323.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7465(2014)01-0001-08

## 一、引言

近年来,人们较多关注于“民工荒”的存在,却忽视了“农业接班人危机”的潜在威胁。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大量农村人口持续向城市二三产业转移,直接造成高素质农村新生代劳动力不断流失。据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调查数据,截至2011年5月末,1980年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占全部农民工的53.6%。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大量流出,导致以农业生产副业化、农村人才空心化和农民老龄化为表征的“农业接班人危机”日益突出;再加上农业生产收益率较低的现实原因,在可预期的未来,农村新生代劳动力外移的趋势将持续下去,那么,与现代农业生产要求相匹配的农业从业者将呈现出日益严重的结构性短缺。“未来谁来种地?”将成为一个亟待破解的重大战略问题。

而另一方面,我国农村教育目标错位,升学教

育、离农教育占据主导地位<sup>[1]</sup>,80后、90后新生代农民离土地越来越远,普遍缺乏从事农业生产的意愿与技能,高素质新生代农民供给严重失衡。造成了农业生产多由妇女和老人来承担的窘境。对此,知识界和学术界均进行呼吁,未来要着力解决“谁来种田”的问题<sup>[2]</sup>。2012年,以师昌绪为代表的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15位院士联名提出,若不从战略上研究并解决“农业接班人危机”问题,我国农业生产将面临后继无人的境地。<sup>[3]</sup>基于此,学术界有责任提出破解之道,为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支撑。本文将就中国“农业接班人危机”问题的分析框架、现实判断和破解思路进行深入研究。

## 二、中国“农业接班人危机”问题的分析框架

从现有文献来看,国内学术界对于“农业接班人危机”问题的关注,较早是从地理学角度入手,把人口转移下的“空心村”看作一种经济地理现

收稿日期:2013-09-22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08&ZD022);河南省政府决策研究招标课题(2013B220);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研究生创新教育计划项目(2013B0817);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2013-QN-227);2013年河南省社科联、省经团联调研课题(SKL-2013-3463)

**作者简介:**韩占兵,男,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博士生,黄淮学院经济管理系讲师,研究方向为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

象,着重探析其形成原因和农村住宅用地整治政策<sup>[4]</sup>。而后,随着“农业接班人危机”的愈演愈烈,逐渐引起了人口学界、经济学界和社会学界的重视,农村人口下降、农村老人农业和土地抛荒或耕种粗放现象越来越受到关注<sup>[5-6]</sup>。然而,学术界多是将研究局限于提出问题,而对于“农业接班人危机”产生的历史根源并没有深究,也没有系统地提出解决之道,缺乏宏观视野的多维考察。事实上,就目前而言,中国“农业接班人危机”问题已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农业生产主体代际转换问题,同时更是一个涉及中国农村改革深化、农业经济转型和现代农业发展的历史逻辑问题,必须以更加开阔的视野和多维的思考,将中国“农业接班人危机”问题置于中国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历史进程中加以考察和判断。基于此,本文构建了一个中国“农业接班人危机”问题的“三维一体”分析框架(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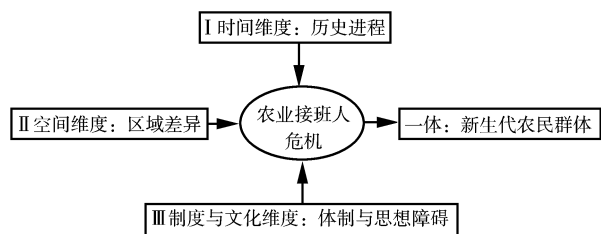


图 1 “三维一体”的中国“农业接班人危机”分析框架

## 1. 时间维度：历史进程

时间维度是考察中国“农业接班人危机”的纵向基本视角,即将中国“农业接班人危机”的产生机理及其破解之道放在中国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历史进程中加以考察和判断。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农业接班人危机”的不可逾越性和历史阶段性(见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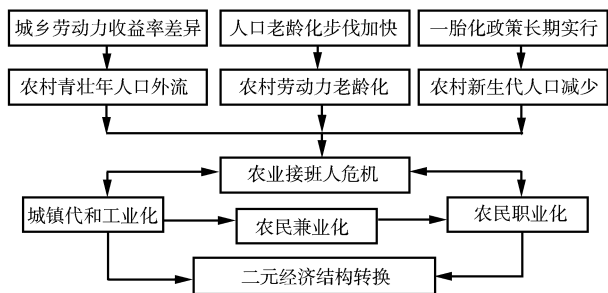


图 2 中国“农业接班人危机”的时间维度分析框架

首先,必须从历史进程角度考虑中国“农业接班人危机”的产生机理。由图 2 可以看出,其一,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劳动力收益率差异所引致的农

村青壮年劳力向外迁移是中国“农业接班人危机”的首要作用因素;其二,在中国整体老龄化进程加快背景下,农业劳动力的老龄化也随之到来,这也是导致“农业接班人危机”的重要原因;其三,中国以“一胎化”为核心的计生政策的长期推行,使得农村新生儿人口数量大幅下降,进而显著减少了农业生产的新生代力量,这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综上,从历史发展轨迹的逻辑出发,我们可以廓清中国“农业接班人危机”的产生根源。

其次,由于城镇化和工业化历史进程的递进性,中国“农业接班人危机”问题是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换过程中出现的必然结果,是中国经济社会由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伴随产物。因此,要破解中国“农业接班人危机”问题,也必须从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宏观视角出发,把农村人口空心化、农民兼业化和农民职业化这三方面内容纳入到一个完整的理论框架中进行分析,构建三者之间的系统关联机制,揭示其中的内在驱动力。在此意义上,学术界必须注重协调中国“农业接班人危机”问题的顶层设计与累积风险之间的辩证关系。

## 2. 空间维度：区域差异

空间维度是考察中国“农业接班人危机”的横向基本视角,即将中国“农业接班人危机”问题置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区域差异结构中来加以考察和判断。中国作为一个地域辽阔的新兴市场国家,人口众多,区域经济发展差异显著是其基本国情。由此,可以反映出中国“农业接班人危机”问题的区域多元性和复杂性。

为了考察中国“农业接班人危机”的区域差异,本研究依托笔者和课题组成员共同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加强农业支持力度的制度创新与政策调整对策研究”的问卷调查。问卷调查于 2012 年分别在东、中、西部的江苏省苏南地区、河南省豫南地区和陕西省关中地区各具代表性区域展开。以调查数据为基础,得出了不同区域 30 个典型村的“农业接班人危机”水平(见表 2)。目前,学术界普遍以“离村率”(长年在外居住人口占原村庄总人口的比例)作为衡量农村人口空心化的评判标准。事实上,“离村率”指标偏重于从农村人口迁移的角度来加以考察,忽视了部分没有长年在外居住但已远离农业生产,无暇顾及土地耕种的农业人口。为了更为准确地表现农村劳动力远离农业生产的水平,本文以农村人口“离农率”作为衡量“农业接班人危机”水平的基础指标。

农村人口“离农率” =  $\frac{P_l + P_w}{P_a} \times 100\%$

其中: $P_l$  为样本村庄常年在外居住生活人口数; $P_w$  为样本村庄经常外出打工但并没有常年在

外居住生活的人口数(为了科学界定离农,笔者将其定义为每年至少在外打工 10 个月以上,无暇顾及农业生产); $P_a$  为样本村庄总人口数。

表 1 东中西部样本区域 30 个典型村庄的农村人口“离农率”水平

江苏苏南	$P_l$	$P_w$	$P_a$	离农率	江苏苏南	$P_l$	$P_w$	$P_a$	离农率
董庄	942	2185	3724	83.9%	小关庄	1578	2032	4732	76.3%
刘庄	631	1577	2866	77.0%	夏庄	1502	1924	4281	80.0%
胡庙	817	1782	3113	83.5%	何寨	633	531	1657	70.2%
大岳	474	1321	2986	60.1%	张集	742	635	1838	74.9%
瓦店	793	2238	3943	76.8%	岗庄	1003	729	2655	65.2%
河南豫南	$P_l$	$P_w$	$P_a$	离农率	河南豫南	$P_l$	$P_w$	$P_a$	离农率
大王庄	837	1846	3648	73.5%	刘王屯	1241	1934	4739	67.0%
李楼	553	1463	2931	68.8%	邵集	952	1322	3218	70.7%
许庄	362	935	1827	70.9%	辛庄	613	971	2426	65.3%
姜寨	87	182	436	61.7%	槐树沟	848	1169	3147	64.1%
姚庄	126	207	532	62.6%	尚店	194	308	733	69.4%
陕西关中	$P_l$	$P_w$	$P_a$	离农率	陕西关中	$P_l$	$P_w$	$P_a$	离农率
刘家坡	431	918	2781	48.5%	油坊子	361	524	1522	58.2%
王家堡	572	1156	1549	67.8%	张家村	318	730	1693	61.9%
蔡家庄	304	532	1727	48.4%	瓦窑	169	173	638	53.6%
桑园	296	389	1284	53.3%	石羊桥	485	783	2194	57.8%
肖家河	133	257	876	44.5%	新岗集	258	524	1406	55.6%

从表 1 可见,东部的江苏省苏南区域 10 个典型村庄的农村人口“离农率”均值为 74.79%;中部的河南省豫南区域 10 个典型村庄的农村人口“离农率”均值为 67.31%;西部的陕西省关中区域 10 个典型村庄的农村人口“离农率”水平均值为 54.96%。由此可以粗略地反映出,东中西部三大区域“农业接班人危机”水平呈现出依次递减的规律。这正印证了我们在时间维度中的判断,区域城镇化和工业化的推进程度与“农业接班人危机”的显现度成正比关系。基于此,不同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性和特殊性构成了考察中国“农业接班人危机”的空间维度的基本内涵。

3. 制度与文化维度:体制与思想障碍

制度维度是把政策性视角作为考察中国“农业接班人危机”的基本取向,即将中国“农业接班人危机”问题置于中国经济社会制度优化的进程中来加以考察和判断。由此,可以洞察出中国“农业接班人危机”问题的制度约束根源及其演进路径。

传统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土地、劳动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投入数量决定农业产出量。但新发展经济学认为,制度安排能够提高土地等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进而显著影响农业生产的产出效率和速度。因此,制度因素是考察中国“农业接班人危机”的重要视角。事实上,当前一些深层次的制

度障碍,严重制约着中国“农业接班人危机”的解决。首先,户籍制度改革进展缓慢,使得大部分进城务工人员处于城乡之间摆渡式的“悬空状态”。城市中较为稳定的打工收入即使其愿意而且有能力留城生活,成为新市民,但户籍的横亘分野阻碍了该群体顺利的“完全离农”,进而导致大量原本可以流动的土地使用权不能大规模流转,制约了农业规模化经营。此外,农民对于自身承包土地拥有完全物权意义上的永久经营权还没有得以实现。农地承包经营权的退出机制还没有建立。以社会保障制度为核心的城乡二元利益格局还没有打破。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弱势地位和歧视性文化认知还没有得以彻底改变。总之,这些历史遗留的扭曲性制度安排需要在更深的治理层次和操作层次上寻求变革和创新,从而优化中国“农业接班人危机”解决的制度环境。

文化维度是从中国长期的文化积淀角度,即从行为主体的价值取向、思维模式和心理结构角度来考察中国“农业接班人危机”的形成因素。首先,受“贱农主义”文化价值观念的长期影响,农业被看作脏、累、苦的代名词,畏苦怕劳的农村青年人不愿从事农业生产。邬欣言等人 2012 年在湖南省长株潭地区对 200 名农村青年人进行的问卷调查显示,仅有 24% 的农村青年人愿意参与农业生产,高达 76% 的人明确表示不愿意。其次,受城市中多



彩生活方式的影响,农村青年人虽然身处乡村,但对于农业和农村的生活方式并不认同,造成其对农业生产“不熟悉、没兴趣、无能力”的尴尬处境。

#### 4. 一体:新生代农民群体

研究框架的确立除了多维视角考察,还需要探讨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即研究主体行为及其后果。对于中国“农业接班人危机”问题而言,其主体行为就是寻找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承担者和实施者,寻找中国未来农业生产的主力军和接班人,同时也是寻找农业现代化和国家粮食安全的基础支撑力量。因此,本文将新生代农民群体确立为中国“农业接班人危机”问题的核心主体。严格意义上讲,新生代农民群体可以定义为1980年以后出生的,完成义务阶段教育而又没有进入大中专院校深造的,正在或即将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新一代农民。解决未来“谁来种地”这个问题就是抓住了中国“农业接班人危机”问题的牛鼻子,那么接下来就要考虑“怎样种地”这个问题了。总之,本文基于中国“农业接班人危机”的复杂性和历史阶段性,尝试提出了“三维一体”的分析框架和研究范式,即以时间、空间和制度三个维度为视角,以新生代农民群体为切入点,以解决“谁来种地”和“怎样种地”为突破口,在对“农业接班人危机”的现实判断基础上,提出破解中国“农业接班人危机”的基本路径。

### 三、中国“农业接班人危机”的现实判断

#### 1. 就中国二元经济结构转换进程来看,“农业接班人危机”问题是必然产物,形势严峻

改革开放35年来,伴随着城镇化和工业化的步伐,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正在经历着历史性的转换。在此过程中,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到非农领域,这是市场经济的要素资源配置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城乡收入差距背景下理性经济人按照劳动收益最大化原则进行自由就业决策的结果。在“城镇拉力”和“农村推力”的共同作用下,大量的农村青壮年人口被裹挟到了人口迁徙的历史洪流中。因此可以说,“农业接班人危机”是中国从二元经济机构向一元经济结构转型迈进的伴随产物,既是挑战,又是机遇。

从国外发达国家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历史经验来看,英国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在1800

年达35%,到1901年降为9%,1980年进一步下降到2.6%。美国1840年的农业劳动力比重为68%,1980年降为3.5%。日本农业劳动力比重在1872年高达85%,1980年下降为11.2%。<sup>[7]</sup>这些国家很好地利用了农业人口大幅下降所带来的历史机遇,大踏步地完成了农业规模化经营的历史任务,进而实现了农业收益率的显著提高,解决了农业接班人问题。然而,中国当前问题的复杂性在于,由于制度障碍的羁绊,中国在农业人口大迁移的背景中,农业人口大幅降低所带来的农业规模化经营的历史机遇并没有得到很好地利用。蔡昉(2007)研究发现,农村剩余劳动力中40岁以上的占50%,而这个年龄段的劳动力在农业生产中就业比例竟然高达85.5%。<sup>[8]</sup>杨竞寸(2006)在江苏省大丰市的抽样调查显示,在所调查的农业劳动力中,男性占39.5%,女性占60.5%,远远高于男性。这说明,中国当前大量的农村土地由妇女和老人来耕种,这是农业副业化和懒人农业的典型表现,直接制约了农业收益率的提高,从而使得农业的职业吸引力降低,产生了多数人不愿意种田的“农业接班人危机”。长此以往,必将对国家粮食安全、农业可持续发展和新农村建设提出严峻挑战。

#### 2. 就中国整体经济框架而言,解决中国“农业接班人危机”问题的长期性障碍因素是务农职业吸引力问题

根据新古典经济学微观理论关于农民务农决策的解释,只有务农收益高于非农就业收益的情况下,农户才会提升务农意愿,倾向于从事农业生产。即“农民”要作为一种职业选择,就必须具有职业吸引力,而这种吸引力主要来自于从事该职业的人理应得到符合社会发展水平的收益报酬。这就与我国目前农业生产收益率较低的现实形成了冲突和矛盾。农业的低收益率造成了撂荒弃田现象逐年增多。以河北易县为例,2012年全县约有2万亩麦田出现季节性的抛荒。而抛荒现象不仅出现在河北易县,在安徽部分地区也出现这一现象。<sup>[9]</sup>要化解这个矛盾,则必须着眼于提高农业收益率。笔者认为,提高农业收益率关键不在政府对农业的高额补贴,事实上,限于政府财力,持续增加高额补贴也很难做到。而主要在于农业生产用地的规模化经营。政府应合理引导兼业化农户和老人农户积极进行土地流转,逐渐使土地向专业化农户手中转移,唯有如此,农民规模化经营的春天才会真正到来。

### 3. 短期内,通过提高农业收益率来解决中国“农业接班人危机”问题是不现实的

学术界普遍建议通过提高农业收益,吸引新生代农村劳动力进入农业生产领域,进而从根本上化解中国“农业接班人危机”问题。就逻辑上而言,此种观点背后隐含着一种假设,即农业收益率提高得足够多,使部分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愿意放弃外出务工,选择农业生产,作出永久性务农的决策。然而,从现实情况来看,此种想法多为一厢情愿。如表 2 所示,近年来,在中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构

成中,非农收入与农业收入的差距逐年扩大,从 1990 年低于零值的-225.8 元上升到 2012 年的 2741.4 元。此处的农业收入是按照农林牧副渔的广义口径进行测算的,如果按照狭义的种粮收入口径测算,则农业收入水平会更低。根据袁隆平(2012)测算,目前农民的种粮收益主要来自于政府补贴,纯粹出自种粮得来的利润只有 7.5 元/亩。<sup>[10]</sup>因此,在当前土地流转滞后和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没有消除的情况下,通过提高农业收益率来吸引青壮年农民留村务农的期望是不现实的。

表 2 中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及历年变动情况 单位:元

	1990 年	1995 年	2000 年	2005 年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农业收入	456.04	956.46	1090.67	1469.6	2231.1	2519.9	2587.8
非农收入	230.27	621.28	1162.75	1785.3	3687.9	4457.4	5329.2
收益差	-225.8	-335.2	72.08	315.7	1456.8	1937.5	2741.4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农业年鉴》。

### 4. 在可预期的未来,中国“农业接班人危机”问题将愈发严重

一方面,中国已经进入人口老龄化的快车道。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我国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 1.78 亿,占总人口的 13.26%,预计到“十二五”末将到达 2.21 亿。因此,在可预期的未来,青壮年农业人口将会持续减少。另一方面,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使得“民工荒”在中国局部地区蔓延,导致非农就业收益快速上升,进一步刺激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加快向非农领域转移。如表 3 所示,

近年来,乡村劳动力中农业劳动力占比逐年下降,从 2000 年的 68.8% 降低到 2012 年的 48.21%,首次低于 50%。同时,外出务工人员逐年增加,其占比从 2000 年的 15.53% 上升至 2012 年的 30.69%。这反映出中国农业劳动力向外迁移的步伐从未停止,并将持续进行下去。因此,总体来看,中国“农业接班人危机”问题将伴随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全过程,直至城乡要素收益实现平衡为止。这是笔者的一个基本判断。

表 3 中国农村劳动力结构历年变动情况

	2000 年	2005 年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乡村劳动力总量(万人)	47962	50387	52599	53244	53685	53222
农业劳动力占比(%)	68.8	59.49	53.36	52.02	50.95	48.21
外出务工人员占比(%)	15.53	24.75	27.63	28.80	29.54	30.69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农业发展报告》。

注:由于国家统计局从 2008 年开始监测全年农民工总量,所以表中外出务工人员中没有包括本地农民工数量,仅衡量外出农民工数量。

### 5. 解决中国“农业接班人危机”问题必须把握好流量与存量之间的辩证关系

从流量层面来看,中国农业青壮年劳动力将持续外流到非农产业,这是历史趋势。政府绝不能为了解决“农业接班人危机”问题而人为地限制劳动力流动。这是必须坚持的原则。事实上,农业人口的大规模外迁,为中国城镇化和工业化的顺利推进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低成本劳动力支持,即学术界所称道的“人口红利”。同时,农业人口的非农化就业也为农村和农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资金支持。如表 4 所示,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对于农民收入的贡献持续增加。1978 年,农民从

非农产业得到的收入仅占其收入总额的 8.2%;到 2008 年,该份额已经达到 45.9%,即农民收入的近一半来自农村非农产业的工资性收入。

从根本上说,中国“农业接班人危机”的核心问题是农民的转型和发展问题。所以,政府应该把解决问题的重点放在农业剩余劳动力这个存量上。蔡昉(2007)估算出目前农村还有 1.2 亿剩余劳动力,剩余比例是 23.5%。<sup>[8]</sup>政府应该考虑如何盘活农村剩余劳动力存量,在提升农民主体性和现代性方面做文章,培育其成为破解中国农业后继接班人的新生力量和主要载体。

表 4 中国农村非农产业对农民收入的贡献

	1978 年	1990 年	1995 年	2000 年	2005 年	2008 年
农村非农就业工资(亿元)	87	1130	4381	7060	11117	15750
农村收入总额(亿元)	1056	5774	13560	18216	24264	34343
收入份额(%)	8.2%	19.6%	32.3%	38.8%	45.8%	45.9%

数据来源:《新中国农村 60 年的发展与变迁》,张晓山、李周著。

四、中国“农业接班人危机”的破解之道

中国“农业接班人危机”问题有其复杂的独特性和历史阶段性,这是一个重大的国情变化(穆光宗,2011)。农业劳动力是在动态中实现供需平衡,必须从现实和长远的动态演进角度,探索破解中国“农业接班人危机”问题的有效途径。为此,笔者提出一个破解“农业接班人危机”跨期限的动态路径框架(见图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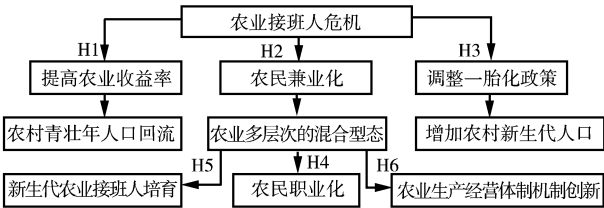


图 3 破解中国“农业接班人危机”的动态路径框架

从短期和长期视角来看,破解中国“农业接班人危机”的可选路径有以下 6 种:

H1:通过提高农业收益率,吸引外流的农村青壮年人口回流到农业生产领域。根据上文分析,此种途径短期内很难实现。

H2:通过农民兼业化,有效处理“进城收益高”和“务农收益低”之间的矛盾,缓解留守农业和老人农业的问题。此种途径较为可行,可以在短期内快速有效地提升农业后备人力资源。通过此种形式的发展,逐步实现农业适度规模化。

H3:通过调整一胎化的人口政策,来增加农村新生代人口,进而弥补农业劳动力短缺。此种途径短期内不可行。因为在我国人口多、基数大的基本国情没有改变的情况下,人口政策的取向依然是稳定低生育水平。

H4:破解中国“农业接班人危机”的长远选择是农民职业化,并最终实现农业的现代化。事实上,西方先行工业化国家正是通过农民的职业化,有力地推动农业规模化、机械化的发展,进而实现农业整体现代化。但鉴于中国复杂国情,此种路径还需进一步探讨。

H5:新生代农业接班人是未来农业生产

的主力军和承担者,同时也是农业现代化和国家粮食安全的基础支撑力量。提高未来农民的人力资本投资水平,将会点石成金<sup>[11]</sup>。因此,进行新生代农业接班人培育就是要直接解决未来“谁来种地”这个问题。

H6:推进农业生产经营方式转型就是围绕中国农业政策体系的局部深层次问题,进行制度优化和调整,进而实现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生产经营方式变革和跨越。

综上所述,本文提出一个破解中国“农业接班人危机”的基本路径:短期鼓励农民兼业化,长期向职业化迈进,同时进行新生代农业接班人培育和农业生产经营体制机制创新。

1. 破解路径 I:鼓励农民兼业化与农民职业化

农民兼业化经营模式在日本、美国、德国、墨西哥等国家都曾经出现过,其中以日本最为典型。农民兼业化为战后日本农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它为增强农业生产的造血机能和抵御农业风险,使工农相互促进,城乡形成良性循环,农民摆脱贫困,走向富裕提供了现实途径。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以来,日本农民兼业化比重迅速提高。专业农户比重由 1950 年的 50.0% 下降到 1985 年的 14.3%,兼业农民比重由 1950 年的 50.0% 上升到 1985 年的 85.7%<sup>[7]</sup>。

现实中,农民兼业化模式在中国已经存在多年,且颇有争议,众多学者对其并不认同,认为农民兼业化与农业职业化和规模化背道而驰,不具有生命力<sup>[12]</sup>。但笔者认为,兼业化生产模式是基于我国当下实际情况的理性选择与合理安排。首先,兼业化的背后反映的是农民的矛盾心态和尴尬境地。一方面,农业生产收益率低的现实迫使其外出务工提高收入,而另一方面又不愿意完全舍弃土地。此种情况下,农民兼业化行为就应运而生。其次,鉴于政府财力有限,未来的农业形态不可能采取欧洲“以补贴促发展”的模式。通过选择兼业方式,改变生产要素的投入量来实现家庭收入的最大化<sup>[13]</sup>,弥补农业收益低的现实困境,是农民自觉的帕累托改进行为。最后,鉴于中国人口众多的特殊国情,农业生产也不可能采取美国的大规模农场模



式,因为它意味着需要一个远比今天的工业体系还要庞大得多的工业体系去消化农村外迁劳动力,从资源环境约束的角度来看,这样会非常危险。由此观之,“兼业化”将是中国农业缓解“接班人危机”问题的必然选择。

进一步分析来看,笔者将兼业农民分为“本地型兼业”和“异地型兼业”。“本地型兼业”有利于农民形成居住在本村的在宅兼业,有效避免农业粗放经营,进而提高兼业效率。农民即可在农闲时进城务工,提高非农收入,又可在农忙时投入农业生产,一举两得。但“异地型兼业”往往会使农民被迫远离乡土,无暇顾及农业产出的效益,最后导致粗放经营或“留守农业”的出现。因此,我们应该积极鼓励农民实现“本地型兼业”,着力减少“异地型兼业”。而促进农民“本地型兼业”的有效手段是农民“就近城镇化”。所以,中国应该大力推动特色产业聚集,着力发展中小城镇。事实上,随着农村非农产业发展,日本也经历了农户“异地型兼业”减少和“本地型兼业”增加的过程<sup>[14]</sup>。

当然,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农民兼业化并不是我国农业发展的唯一选择,它只是缓解中国“农业接班人危机”问题的一种务实选择,是走向职业化经营过程中的“中转站”。可以预期的是,再过十年、二十年,待到老一辈农民故去后,“老人农业”和“留守农业”会无以为继,中国农业将迎来由兼业化向职业化转型提升的新阶段。因此,未来的中国农业将是一种多层次的混合型态,即是农业兼业化生产和职业化生产并存,大一中一小规模生产方式共生的多样性组织业态。

## 2. 破解路径Ⅱ:新生代农业接班人培育

新生代农业接班人是正在或即将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新一代农民。该群体成长于中国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加快的大背景下,优点和缺点都非常明显。优点是文化程度较高、市场观念较强、自我发展意识不断提高,缺点是家庭本位弱化、厌农思想严重。思想观念上的障碍使得该群体宁愿外出务工也不愿意经营农业生产,同时也导致他们对现代农业发展的机遇认识不足。未来政府和社会层面要着力消除对农民的歧视观念和落后思想,倡导和树立“农民”是一种职业而不是身份的理念,提升农民的“职业吸引力”和永久型务农意愿。国家应着力实施“新生代农业接班人培养工程”和“新务农人员援助工程”。通过前者,既培养他们种粮经验和农业技能,又培养他们规模化、产业化的经

营理念;既培养他们农业科技知识,又培养他们热爱农村的乡土情怀。通过后者,为农业“新入职者”提供财政补贴、金融支持、风险规避、信息共享、法律保障等多方面的扶持,尽快培育其成为现代农业经营的新生力量,成为职业化农民的雏形和初样。

## 3. 破解路径Ⅲ:推进农业生产经营体制机制创新

首先,应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专业大户和农业企业都是近年来中国农业生产经营领域涌现的新型经营主体。对于此,国家应该鼓励和提倡,促使其积极发展和开拓发展空间。另外,还要加快农业的组织和制度创新,在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基础上,着力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着力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

其次,要积极促进农地流转,为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和收益率提高创造基础条件。近年来,中国从政策层面鼓励土地流转和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但步伐较为缓慢,土地流转参与率很低<sup>[15-16]</sup>。当然这与农村中现存的土地使用权商品属性不明确、农地细碎化严重、土地市场建设滞后和相关法律缺位有很大关系。未来,政府要勇于进行新的制度设计,破除影响农地流转的体制机制障碍。

最后,应优化和调整农业支持政策。2004年至2013年,中国连续十年下发了十个关于“三农”工作的中央1号文件,对农业投入的力度逐年加大。学术界普遍认为,近年来中国实行的粮食补贴政策对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和促进粮食生产具有显著的作用。但是不容忽视的是,这些农业支持政策大多是“普惠式”的,政策实施目标集中度不明显,造成了许多拥有土地但实际没有种田的农民照样可以领取高额补贴。建议国家进一步优化制度安排,真正建立起基于规模经营目标瞄准的农业支持政策。

## 五、结论

在工业化和城镇化飞速发展的背景下,“农业接班人危机”在中国广大地区逐渐显现。其中,以“老人农业”和“留守农业”为表象的农村人口空心化影响最为显著。这一方面对中国的现代农业发展、粮食安全和新农村建设构成了直接威胁,同时也为改造传统农业,提升农业规模化和产业化水平

提供了历史契机。为此,我们应努力消弭其负面影响,短期来看,以鼓励农民就地就近城镇化为手段,推行农户“本地型兼业”模式;长期来看,以推进农民职业化为基础,同时进行新生代农业接班人培育和农业生产经营体制机制创新,促进农业由传统小农分散经营向现代农业跨越,以此来大幅提升农业收益率,吸引更多的新生代农民进行职业化和永久型务农,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农业接班人危机”。

### 参考文献:

- [1] 柯炳生,陈华宁. 对培养新型农民的思考[J].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6(4):36-38.
- [2] 朱启臻,杨汇泉. 谁在种地——对农业劳动力的调查与思考[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162-169.
- [3] 李剑平. 15位两院院士联名上书中央:提防人口大国无人种地[N]. 中国青年报. 2012-03-19.
- [4] 刘彦随,刘玉,翟荣新. 中国农村空心化的地理学研究与整治实践[J]. 地理学报,2009(10):1193-1202.
- [5] 周祝平. 中国农村人口空心化及其挑战[J]. 人口研究,2008(2):45-52.
- [6] 陈池波,韩占兵. 农村空心化、农民荒与职业农民培育[J].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74-80.

- [7] 梅建明. 二元经济结构转换与农业劳动力转移[J]. 上海经济研究,2003(6):8-14.
- [8] 蔡昉. 破解农村剩余劳动力之谜[J]. 中国人口科学,2007(2):2-7.
- [9] 金微. 河北易县2万亩麦田抛荒,农民称“种小麦亏钱”[N]. 每日经济新闻. 2012-10-16.
- [10] 袁隆平. 建议政府高价收粮、平价售粮[J]. 农村工作通讯,2012(6):26.
- [11] Theodore Schultz. Transforming Traditional Agriculture [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4.
- [12] 速水佑次郎. 农业经济论[M]. 沈虎,等,译. 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3:287-293.
- [13] 李庆,等. 农民兼业化与农业生产要素投入的相关性研究[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3):27-32.
- [14] 高强. 我国三大地带农户兼业形态研究[J]. 经济地理,1999(1):74-77.
- [15] Yao, Ya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and Lease Market in Rural China[J]. Land Economics, 2000(2).
- [16] 钱忠好. 非农就业是否必然导致农地流转[J]. 中国农村经济,2008(10):13-21.

(责任编辑:宋雪飞)

## “China Agricultural Succession Crisis”: Analysis Framework, Realistic Judgment and Solution

HAN Zhanbing

- (1.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Wuhan 430073, China;
2.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Huanghuai University, Zhumadian 463000, China)

**Abstract:** “Agricultural succession crisis”, a complicated problem to cope with in China’s urbaniz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 posed a severe challenge to the food safety, sustainabl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new rural construction. The author worked out and established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three dimensions and one subject”, with which he was to make a practical judgment on China “agricultural succession crisis”. He then put forward the strategic orientation and policy-making choice and finally came to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short-term realistic solution is farmers’ engagement in concurrent businesses and the long-term way-out is the professionalisation. At the same time, the new generation successor cultivation and the innova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 mechanism should also be carried out.

**Key words:** Agricultural Succession Crisis; Farmers’ Concurrent Business Engagement; Farmers’ Professionalization